

第一章

贸易结构的调整 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1.1 “中国制造”与外国品牌

如果你今天到国外去旅行，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能看到“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的产品。这些“中国制造”的产品基本上是在过去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逐渐出现在这些国家市场上的。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除了唐人街能看到中国生产的产品外，国外市场几乎没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到 80 年代中后期，先是在地摊上，然后在廉价商店里，逐步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90 年代以来，中国制造的产品以迅猛的速度进入外国市场，主要是大型低档超市和一般百货商店。到 90 年代后期，中国制造的商品甚至进入国外中高档商店了。有的美国人说，从早晨起来的闹钟到晚上睡觉前的台灯，日常生活中几乎时时处处都有“中国制造”的用品了。然而，除了一些低档产品外，能够进入国外中高档商店的“中国制造”产品几乎都打着外国的品牌。从耐克的运动鞋到索尼的摄像机，几乎应有尽有。为什么中国出口了那么多的“外国”产品，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去的 20 多年时间里，各种外国商品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中国市场，并且很多的“外国”商品“中国制造”。为什么这些外国商品不是在国外生产然后出口到中国，而是在中国生产后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呢？

中国不仅出口和进口产品，还在本国生产“外国”产品。这些产品往往用进口的机器设备，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加工生产后出口，同时也在国内市场销售。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的反映，是中国现实比较优势

的体现。中国生产外国品牌的产品后无论是出口还是在国内市场销售，其实都是在利用劳动力便宜的优势。环顾世界，可以普遍看到，某一个品牌的产品，其零部件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地点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和加工；然后又出口到多个国家去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中国已越来越深地参与到这种全球化的进程中去了。由于这种参与 中国的贸易结构 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 在 20 年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从占出口总额的 50% 不到，增加到了近 90%（见第四章的相关数据）。而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中，虽然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和服装仍是主要的出口品，但是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如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的出口，近年来已呈较快的增长势头。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生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整，使得各国都能更充分地利用其现有的比较优势。

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中国的贸易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结构有所升级，真正中国自己品牌的产品也已经开始崛起，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自己的品牌还是凤毛麟角；而且即使是资本或技术密集的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过程仍是劳动相对密集的。中国现在的对外贸易按出口算已列世界第七位，占世界对外贸易的 3.9%，可以说是一个贸易大国了。但是，由于中国对外贸易中超过一半是加工贸易 并且主要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 由于大量的“中国制造”产品还是外国品牌，因此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贸易强国。中国应当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这就需要在推动贸易数量增加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动贸易产品质量的提高和贸易结构的转变。

从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都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还比较落后，只能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的制成品时，由于产品的标准化程度高、多样化程度低，因此生产类似产品的国家之间没有互补性，它就只能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间的贸易，出口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进口资本密集或人力资本密集的产品，以及高新技术产品。这是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状

况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主要生产和出口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由于产品品种具有多样性，它就可以与发达国家进行一部分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如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交换或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交换高技术产品），同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间贸易（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交换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使自己的贸易市场不断扩大。现在的新兴工业国家大体上处在这样的阶段。当然，如果一个国家不仅能够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而且能够生产和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它就可以在与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进行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的同时，也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一部分产业间贸易。欧、美、日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这种情况。显然，从上述三个阶段或三种情况看，我国还处在第一阶段的后期或第二阶段的初期，我们还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的产品出口也在增加。

如果我国能够把现在出口的“中国制造”的外国品牌的产品转变为中国自己的品牌，如果我们能够从目前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成为本国工业制成品而不是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大国，那么我国的贸易结构就会得到根本的转变，我国也就可以真正成为贸易强国。而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最根本的条件就是需要比较优势的转变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比较优势的转变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受制于各种决定比较优势和技术水平的基本条件，比如，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资本存量及其积累速度、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与速度，等等。在这些条件没有得到基本满足之前，技术水平不可能显著提高，比较优势也不会根本改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上述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地区也是不一样的，因此，这种比较优势的转变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并不是各个地区在时间上都能一致地同时达到的。东部地区由于开放较早，经济比较发达，对外贸易发展较快，可能会比较快比较早地实现这种转变，而中西部地区可能会相对慢一些。但是中西部地区在中国加入 *WTO*、更大程度开放的情况下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政策条件，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实现更快的转变也不是没

有可能。

1.2 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与“数字鸿沟”

我们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推动比较优势的转变，才能真正从一个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但是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转变为贸易强国呢？更一般地说，中国现在加入 WTO，更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可以更好地利用我们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不也很好吗？确实，能够发挥和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当然是好事。按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很容易判断说，这能够使中国的资源得到更优化的利用，从而使全社会的经济福利提高。毫无疑问，我们入世以后应当更充分地发挥和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经济福利。但是对中国这样现在还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仅仅发挥和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做一个为别人加工产品的贸易大国，从长远来看，并不一定有利于我国经济长远的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并不会自动提高一个落后国家的技术水平，从而迅速转变比较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如果不努力实现这种转变，我国经济就有可能被边缘化，只能处于为跨国公司打工的境地。

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各国逐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开始明显地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以及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的结合，经济全球化更以迅猛的势头发展。从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商品、服务、资本、劳动、技术、信息在全世界更迅速、更自由、更便宜地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自由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正是从 80 年代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开始改革开放，逐步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

经济全球化虽然会从全世界的角度使资源得到更优的配置，从而使加入到这个进程中去的各个国家都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其现

有的比较优势,但是,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的得益并不是均等地分配给各个国家的。事实上,在国际竞争中,那些技术进步快的国家往往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益大些,而那些技术进步慢的国家得益就会少些,从而使国家间的差距扩大。导致落后国家得益可能较少的原因,从需求方面讲,在于它们生产的产品主要还是以资源为基础的或劳动相对密集的生活必需品。这些产品的需求弹性一般都比较低。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人们在收入增加时,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比例会不断下降。一般说来,对粮食的需求弹性最低,对服装和一般日用品的弹性稍高些,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这类产品的支出也会相对减少,而对家用电器、高档消费品、汽车、房屋、以及各种服务的需求会不断增加,这种需求的变动会导致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以及其他一般消费品的价格相对于高档消费品以及各类服务的价格不仅不能提高,而且还不断下降,使贸易条件恶化。很显然,如果一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而进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上升,那么即使这种贸易使双方都得益,也必然是贸易条件恶化的一方得益较少。

导致落后国家得益可能较少的原因,从供给方面讲,在于它们的技术进步和出口产品升级比较慢。如果低档次的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那么只有不断推动技术进步,使出口产品的结构不断升级,才有可能避免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虽然得益但仍然差距扩大。这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虽然一般地能使一个国家得益,但它并不能保证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当然,不参与全球化可能什么得益都没有,但是参与全球化而不推动技术进步,可能也不会使原来先进的国家继续保持先进,使落后的国家赶上先进国家。如果只注意参与全球化,利用比较优势,而忽视推动技术进步,很有可能落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洪银兴,1997)。从理论上说,在一个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技术进步最终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因为技术进步使成本降低;而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价格基本上等于成本。然而,由于市场并不总是接近完全竞争的,并且技术创新一般得到的

专利保护会有一段时间的暂时垄断，因此，取得技术创新的企业往往并不会把创新后效率的提高全部转化为价格的降低上去，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要素报酬的提高，特别是转化为创新最需要的要素的报酬提高上。比如，在信息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的迅速创新一方面使信息产品的价格下降，另一方面也使信息技术产业的工人收入提高，其中信息产业中技术工人的工资提高又快于非技术工人。这就使得信息产业中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信息产业工人与非信息产业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发生信息技术革命的国家总体上工人收入都在增加，因此与没有发生信息技术革命的国家相比，两者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这就在一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出现了所谓的“数字鸿沟”。那些处于“鸿沟”低端的国家或群体就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被逐步边缘化。

上个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得益于它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上的领先。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展开，那些抓住时机、迅速跟上信息技术革命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能够得到一般的比较优势得益，而且也能获得技术进步的得益，从而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缩小，爱尔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也有不少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赶上这次技术革命，从而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开了。总体上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过去的 10 年中并没有缩小，而最不发达国家与世界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 (World Bank, 2000)，最不发达国家占世界贸易的份额 1997 年比 1980 年下降了一半，只占世界的 0.4%。15 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东亚、拉丁美洲、欧洲) 占了 1997 年私人长期资本净流动的 83%，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 2%。这是由于带动 90 年代经济增长的信息通讯技术在全世界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比如作为通讯和上网的主要渠道的电话线就极不平衡。在 1996 年估计全世界有 7.41 亿条电话接入主线 其中 5.13 亿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达国家 占 69.2%。电话密集度在发达国家是每 100 人有 45 到 65 门，OECD 平均是 47.1 门，而在主要的非 OECD 国家为 5.2 门，其中中国 4.5 门，印度 1.5 门 (OECD,

1999) 信息技术产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几乎为零,即使有些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不少也是由外国跨国公司建立并生产的并且其产品和服务相当程度上是出口的(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去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大量进口了信息技术产品,而且还大量“进口”了技术工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比如美国硅谷有 1/3 的劳动力来自于外国,其中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印度的工程师新创办的企业已占硅谷新创办企业的 29% (Saxenian, 1999)。大量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入发达国家。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生产和消费信息技术产品的能力都得不到提高,从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数字鸿沟”只是对这次信息技术革命中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种描述。其实,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导致掌握新技术的群体和国家与不掌握新技术的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显然,一个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掉入“数字鸿沟”之类的陷阱就必须加快技术进步。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显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了(如 Solow, 1956; Swan, 1956; Romer, 1986; Lucas, 1988 等)。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取得技术进步其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更进一步说,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否赶上先进国家,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能够比先进国家增长得更快些,而不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

中国在过去的 20 年里经济增长很快,就是依靠要素的投入,主要是资本的积累,以及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表 1.1 和表 1.2 可以看到 尽管对于中国过去 20 年左右的经济增长因素有不同的估计 但是不同研究的结果都显示 在经济增长中 劳动的贡献是最低的 资本的贡献是最高的 而且总要素生产率 (TFP) 也有很大的贡献。劳动贡献低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多 边际生产率低 而资本贡献大 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存量较少 边际生产率高。总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一般被认为与技术进步相关。但是总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变动很难识别 在一个经济体制比较稳定的国家里 它的变动大体

上与技术进步一致 因此 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说基本反映了技术进步的程 度。然而，中国是一个经济体制处于不断改革的国家 因此 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能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在过去 20 多年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可能比表 1.1 和表 1.2 中总要素生产率所反映的要低。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国虽然有技术进步 出口产品结构也有提高 但总体上提高不快 至今还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原因所在。我们从表 1.1 中也可以看到，我国的劳动投入增长已明显慢于资本的增长 因此 从长远来看 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必然会降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相应降低。这样 如果没有技术进步 随着要素边际生产率的下降 经济的持续较高速度的增长就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克鲁格曼会利用杨等人的研究结果说亚洲没有奇迹 (Krugman 1994) 的原因。

如果说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 那么问题是 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是否有利于一国的技术进步？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决定的因素很多。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看 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推动对外贸易 肯定比闭关锁国要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通过闭关锁国完全自力更生实现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的。同样，也没有任何事实告诉我们，有哪一个国家仅仅是通过发挥和利用其现有的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 就赶上了发达国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济全球化可能并不一定有利于相对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从而不一定有利于落后国家的经济长期增长。一个像中国这样还相对落后的国家，不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显然是不行的。但是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 参与国际分工 而不推动技术进步 也并不对一个国家有利。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技术日益重要的今天，中国必须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加紧推动技术进步，才能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 才能有长期的发展动力 才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表 1.1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1979~1997) (%)

	1979~1997	1978~1990	1991~1997
GDP 增长	9.8	9.0	11.2
资本投入增长	9.7	8.8	11.2
劳动投入增长	2.9	3.9	1.2
TFP 提高	2.9	2.2	4.1
资本贡献	58.5	58.2	58.7
劳动贡献	12.2	17.5	4.6
TFP 提高的贡献	29.3	24.2	36.8

资料来源 王梦玺 1999 第 167 页。

表 1.2 有关中国增长核算的研究比较

时期	GDP 增长率	TFP 增长率	资本贡献	劳动贡献	数据来源
1979~1994 (所占百分比)	9.3 100.0	3.9 41.6	4.2 45.6	1.2 12.8	Hu and Khan (1996)
1979~1995 (所占百分比)	10.6 100.0	4.2 39.9	5.0 46.8	1.4 13.3	李京文等 (1996)
1980~1986 (所占百分比)	8.5 100.0	3.32 39.1	3.34 39.3	1.84 21.6	Bosworth et al (1995)
1978~1997 (所占百分比)	9.8 100.0	2.9 29.3	5.7 58.5	1.2 12.2	翟凡(1999)

资料来源 王梦玺 1999) 第 168 页

1.3 入世、技术进步与贸易结构

目前 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浪潮中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中国又面临加入 WTO 的重大转折。显然, 加入到 WTO 中去 就意味着中国能够更加开放, 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分工, 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然而, 这样的进程会有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吗? 会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吗?

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产业从低级到高级按资本密集度和技术水平排列 越是低级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越低 (劳动密集度越高) 技术水平也越低; 而越是高级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越高 (劳动密集度越

低)技术水平也越高。^① 可以看到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由于它们的比较优势主要在资本和技术方面, 因此它们利用比较优势与推动技术进步一般不矛盾, 它们越是推动技术进步就越能加强和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比较优势一般还在自然资源或简单无技能的劳动力方面, 因此充分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就可能与技术进步发生矛盾 要推动技术进步 现有的比较优势可能就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而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 可能就意味着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速度放慢。由于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 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 因此 如果产业结构无法升级 技术水平无法提高 贸易结构也就难以改变。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加入 *WTO* 更大程度地开放 更自由的贸易 以及可能更多技术先进的外商投资进入 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国际市场 更快地接触到新产品、新工艺、新设计 以及新的理念、新的创意, 从而也更有利于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 尽管加入 *WTO*, 更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 并不能保证一个落后国家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是至少它比闭关锁国提供了更多的提高技术水平、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

上面提到的利用比较优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矛盾, 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解决的。一方面 比较优势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 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有的因素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有的则是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来改变的。另一方面, 技术也有不同的类型, 有的技术会与现有的比较优势发生矛盾, 有的并不矛盾, 因此, 把技术区分清楚也有助于我们避免或缓解它与利用比较优势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那些不与现实比较优势矛盾的技术, 又能够较快地促进比较优势的转变, 那么在加入 *WTO* 后 就

现实世界中产业当然不会完全如此排列。比如, 像计算机软件、专业咨询等产业就可能不是物质资本密集的它们往往是人力资本密集的, 技术和知识水平也是很高的。反过来说, 简单无技能劳动密集的产业一般总是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但是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排列来进行分析

能够一方面更深地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更快地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为此，下面先把关于比较优势和技术进步的不同概念，以及本书要着重讨论的贸易结构含义解释一下。

1.4 技术进步与比较优势的不同概念

本书主要讨论中国的贸易结构问题由于影响贸易结构的因素很多，包括国内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动、经济体制改革、比较优势状况、国际市场前景、其他国家的竞争等等。显然，在一本书中要把所有这些问题讨论清楚是不可能的。本书主要从国际国内经济大背景出发，来讨论中国的贸易结构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变动。对中国来说，目前对外开放的最大转折是加入 *WTO*，而从国际趋势来看，主要的趋势就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上面已经提到的，中国加入 *WTO* 就是更全面更深入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因此，比较优势问题就是影响贸易结构变动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现在正处于增长相对缓慢、需求不足的局面。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迅速增长，但是这一增长主要是通过大量的要素投入取得的，技术进步的作用还不是很大。在技术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今天，技术进步就是影响中国今后产业变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本书将就中国加入 *WTO* 后比较优势和技术进步这两个主要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可能矛盾来探讨中国的贸易结构问题。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探讨中，上述影响贸易结构的因素大多都会涉及，虽然往往不是直接涉及。有些因素，如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由于不是本书重点讨论的内容，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总括地讨论。

由于本书主要从比较优势和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研究贸易结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了比较优势、技术进步及贸易结构等概念，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现在把这几个概念界定一下。

提到比较优势，一般都把它与要素禀赋联系起来，指一国各种

要素比例与世界此方面比例的比较。如果一国某一要素的相对供给大于世界供给，则这一要素就是该国的丰裕要素，也就是该国比较优势所在。比如，中国的人口最多，不仅绝对数量多，而且相对于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也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多。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国的现实比较优势当然就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上了，一个国家如果生产其丰裕要素相对密集的产品，也就是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中国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就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了。上面我们提到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本密集型产品也都是这样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从一般的观察可以看到，越是高级的产业一般说来资本密集度越高，技术含量也越高，因此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其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生产和出口资本相对密集、技术比较先进的产品是有困难的。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是由李嘉图提出来的，只是李嘉图的理论建立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即一个国家中，那些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比较高的部门，就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而相对劳动生产率低部门就是具有比较劣势的部门。但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相同产业会有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呢？比如同样是纺织，为什么甲国的一个工人一天织的布比乙国多呢？这里当然有许多原因，比如企业的激励机制、组织结构、国家的产权安排、市场发育程度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这些方面两个国家都相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还会来自何处呢？显然技术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甲国工人织布技术方法好、技术水平高，而乙国工人织布方法原始、技术水平低，甲国的生产率当然就高于乙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就不会与比较优势有什么矛盾，因为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不断升级，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比较优势也就逐步转变了。因此，在分析比较优势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区别李嘉图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比例比较优势。

在上述区分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

禀赋主要有劳动力、土地、各种自然资源、资本等。土地和各种资源是外生给定的。劳动力的增长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它基本上也是外生的因素。资本的积累当然与经济本身的增长密切相关，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做是由国民储蓄倾向决定的，而国民储蓄倾向又是由文化、习惯等经济以外的因素决定的，那么，资本这个因素也可以认为是外生的。而李嘉图的劳动生产率主要由劳动者的素质、分工和技术进步决定的按照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说法（*Yang and Ng, 1993*），分工本身会由于专业化生产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强化比较优势，因此，它是一种内生的比较优势。如果我们承认技术是内生的（技术进步主要不是因为某些人对发明创造的嗜好，而是由于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而不断发生的），那么劳动生产率，从而比较优势，也是内生的显然，外生给定的因素相对来说比较难以调整，特别难以在短时间内调整，而内生的因素却相对比较容易调整。

技术进步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从技术进步对要素使用的节约程度来看，它可以分为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和中性的技术进步所谓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是指发生技术进步后生产中的资本/劳动比例提高，劳动使用相对减少。而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正好相反，是资本的使用相对减少。中性的技术进步是发生技术进步后两种要素的使用同比例地减少。更严格地，我们用希克斯中性的概念，即发生技术进步后，生产中各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变。虽然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技术进步都是节约劳动的，但是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本书下面提到的技术进步一般都指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又可以其对经济部门的影响而分为通用技术和特定技术所谓通用技术是指所有产业都要使用的技术这种技术进步往往引起一轮产业革命。比如第一次产业革命时的蒸汽机、第二次产业革命时的发电机、现在到处都在使用的计算机。这些技术的使用使得所有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生产率都得到提高。。特定技术是指只限于某个产业使用的技术，如纺织技术、炼钢技术等。。这类技术进步一般只使某个产业的生产率提高，而并不惠及

其他产业。本书下面将主要从这两个角度讨论技术进步与比较优势 主要是要素禀赋比较优势 之间的矛盾问题。

贸易结构是本书讨论的中心问题，广义地说，它包括进出口产品结构、进出口市场结构、进出口贸易的国内地区结构等诸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又是一个经济正在转型的国家，因此贸易结构还可以从所有制结构、加工方式等方面去看。进出口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一般地说，进出口产品结构包括货物贸易产品结构和贸易服务产品结构，由于后者的数据较少且不统一，本书将主要讨论货物贸易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是指我国出口的主要市场构成和进口的主要来源地。由于我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还是美国、欧洲、日本及亚洲国家（地区），我们将重点分析我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结构。地区结构是指我国国内进出口的地区分布。我们将一般地讨论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对外贸易分布。由于广东是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最快、比重最大的省份，而上海是我国技术相对最先进的地区，我们还将对这两个地区的贸易结构进行一定的比较。至于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等问题，我们将结合上述三个方面的讨论，特别是第一个方面的讨论一起进行。

1.5 分析的方法与本书的结构

现在中国已经加入 *WTO* 但是加入 *WTO* 更大程度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也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对这方面的控制和管理。事实上，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完全自由的贸易，而是“有管理的”贸易。如果我们能够制定比较恰当的战略和政策，这种矛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从而使中国在加入 *WTO*，进一步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的同 时，也能推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本书就是在回顾分析中国过去 20 多年贸易结构变动的同时，重点讨论中国加入 *WTO*，进一步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的大背景下，贸易结构如何进一步调整和升级。

本书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讨论分析目前中国的贸易结构现状，以及在给定的条件下将来可能的变化。研究贸易结构问题当然是为了探讨贸易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将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讨论什么样的贸易结构最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中国相应的战略和政策是什么。

由于中国入世是对外开放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本书第二章先讨论中国加入 *WTO* 的问题，作为后面分析的背景。第三章对技术进步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的理论探讨，以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分析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包括货物产品结构和 service 产品结构。第五章则横向研究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重点是美国、欧洲、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第六章探讨对外贸易的国内地区分布，主要以东、中、西三大地区为基本单位，分析三大地区在过去 20 多年时间里的对外贸易变动情况。本章还对东部地区出口比例最高的广东和技术水平最高的上海进行比较分析，对西部地区则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分析。第七章着重分析各种可能影响中国未来贸易结构变动的因素，并对中国未来的贸易结构变动进行简单的讨论。

第 二 章

入世与贸易改革

2.1 反倾销案例增加说明了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不断快速增长,但是在这同时,面临的国外对中国出口的倾销指控也越来越多。现在,中国已成了最大的被指控倾销的国家。自 1979 年 6 月欧盟对我国糖精发起首例反倾销调查以来,我国产品累计遭到近 400 起反倾销起诉,据外经贸部保守估计,出口直接损失达 100 亿美元以上。我国遭受反倾销指控不仅多,而且呈上升趋势。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只有 2 起对中国的倾销起诉,80 年代共有 63 起,平均每年 6 起。进入 90 年代以后,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剧增,平均每年达 30 起左右。^①现在,对华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已从 1988 年以前的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 4 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扩大到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墨西哥、巴西、阿根廷、韩国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涉及的产品也从简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扩大到化工、钢铁、轻工、机电、纺织、电子等多种产品。^②但是总的来说,除了墨西哥外,对华反倾销指控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产品也主要还是劳动和资源密集的产品。以美国为例,从 1980 年美国首次发生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起到 1997 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已经有 66 起,涉及的产品主要有三类。一是资源性产品,如硫酸锰、聚乙炳醇、钨砂等,这类产品不多;二是农副土特产品,如蜂蜜、小龙虾等,这类产品很少;

① 以上数据来自《国际金融报》2001 年 1 月 14 日‘点金周刊’。

② 以上数据来自《国际金融报》2001 年 1 月 14 日‘点金周刊’。

三是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 这类产品最多 包括棉花布、蜡烛、铁钉、电风扇、自行车、铅笔等 杨国华,1998)。

从不断增长的反倾销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否确实倾销 都存在两个事实。第一 我国许多出口产品价格很低,而这些低价格产品一般也都是劳动密集的、低档次的、低附加值产品。虽然近年对华反倾销指控的产品范围已有所扩大 涉及到了钢铁、机电、化工等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 但是这些产品总体上不多 而且大多也是低档次的产品。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之所以低(不管是否倾销)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的劳动力便宜。第二 由于我国不是 *WTO* 成员 因此 无法根据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这些指控。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尽快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并加入 *WTO* 都是十分必要的。尽快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减少低档次、低价格产品的出口,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我国的倾销指控。加入 *WTO*, 可以使我国在面临倾销指控时有较公平的应诉机会和渠道。但是,加入 *WTO*, 更大程度地开放本身,并不能保证使我国的产品档次提高。因为在国际贸易中 越是开放,越是参与国际分工,也就意味着现有的比较优势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 入世对中国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并不一定有利 但是入世后中国至少可以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应对国外的反倾销指控了。它对中国贸易结构的调整也将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主要通过对中国贸易体制和贸易政策的影响体现出来

显然 入世后中国的贸易体制将会有更大的改革 中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也将有重大的调整。这种改革和调整的依据就是中国人世的承诺。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因为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 中国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贸易改革和政策调整。因此 本章下面第二节先对中国的贸易改革和入世准备进行简短的回顾。然后第三节和第四节对以 *WTO* 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我国加入 *WTO* 的承诺进行探讨。加入 *WTO* 后,中国的经济更加与世界融为一体,贸易也更加自由了。入世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使中国的比较优势更充分地体现出来,但是对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并不必然有利 这种进程对产业升级、贸易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